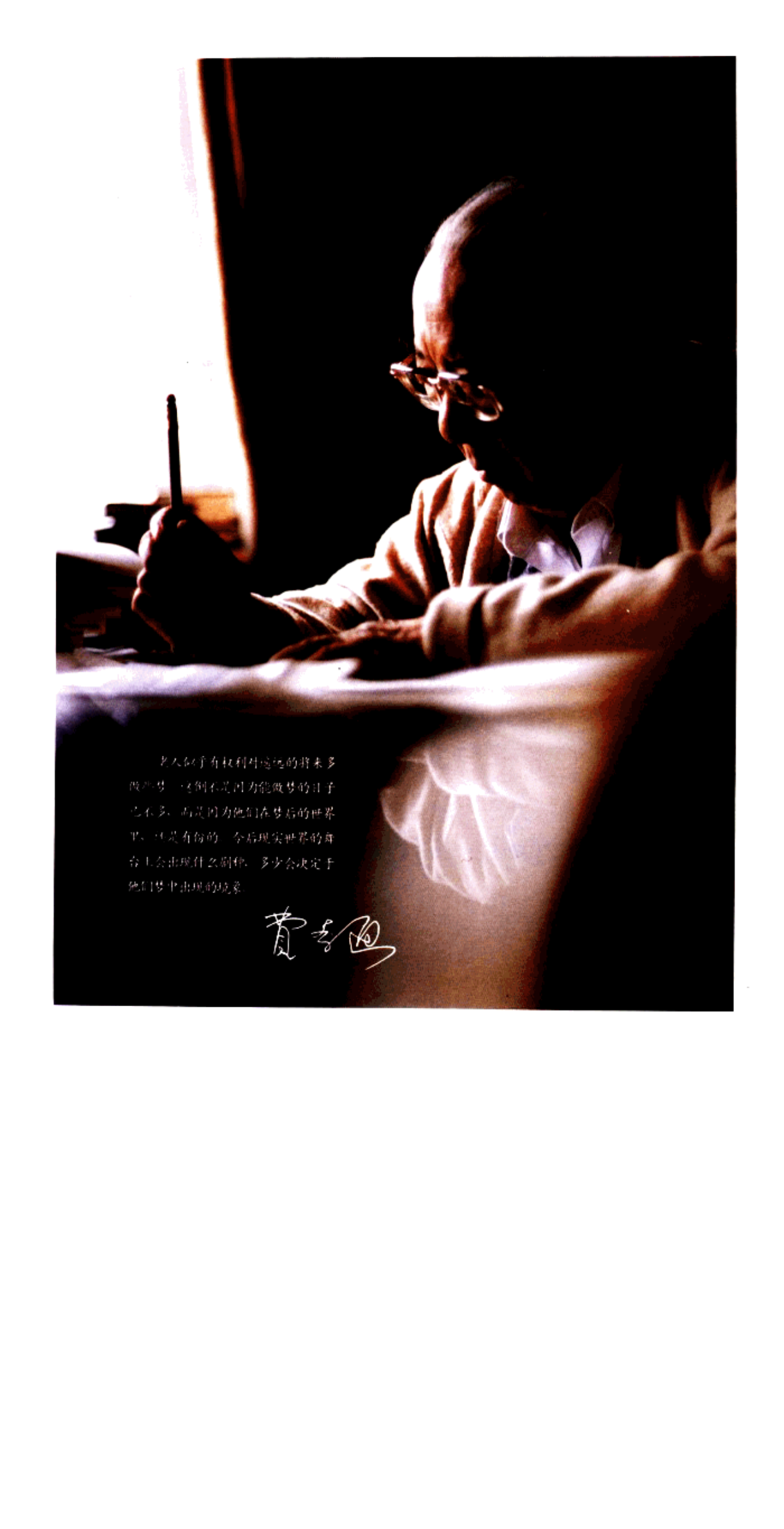


費音通



A high-contrast,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of an elderly man with glasses, wearing a suit and tie, sitting at a desk and writing with a pen. The lighting is dramatic, coming from the left, casting deep shadows and highlighting the man's face and the desk. The background is dark, and the overall mood is contemplative and focused.

老人似乎有权利对远他的将来多做些梦。这倒不是因为能做梦的日子已不多，而是因为他们梦后的世界里，还是有份的。今后现实世界的舞台上会出现什么剧种，多少会决定于他们梦中出现的景象。

费孝通

皓首不移

費孝通



癸酉年春

脚踏实地
胸怀全局
志在富民

目 录

八十自语(代序)	6
家世与早年求学	7
瑶山民族调查	10
初访江村	14
负笈英伦	16
内地农村调查	18
第一个学术丰收期	21
重访江村	24
第二次学术生命	28
重建中国社会学	29
三访江村	37
小城镇研究	39
追踪乡镇企业发展	43
民族研究与边区开发	48
区域发展调查	68
初访小岗	78
三访广宗	79

重访温州	80
三访赤峰	82
四访贵州	84
五下沧州	85
六上瑶山	86
六访河南	87
八访甘肃	88
二十八访江苏	89
从江村走到大城市	99
心系穷困乡亲	100
爱我家乡	106
家人与家居生活	116
薪火相传	126
从生态研究进入心态研究	130
忆师念友话“做人”	142
行行重行行	1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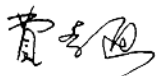
八十自语（代序）

我的生命已经跨入八十岁的界限。孔子说到七十就停住了，因为他没有跨过八十的界限。八十之后应当怎样，现代的人才资格说，我国平均年龄已达到七十以上。进入八十岁的人越来越多了。超过八十岁，以多寿为祝的传统中应当说是件好事。事实上是不是件好事，是有条件的，条件就是社会生产力是否能养得起体力衰弱的老年人。在中国使多寿成为好事还有待我们的努力。

人寿又似乎属于不受主观意志所转移的范围。我早年确实没有料想到从小就以羸弱为父母所愁的幼子会活得这样长，超过了全国的平均年龄。既来之，则安之。这是我跨过这条年龄线的第一念头。安之看来还是不够的。不仅自己要安，还得使人家也安，那就是不能成为社会包袱。我自己明白，过去的八十年，受之于社会的远过于我对社会作出的贡献。食之者众，生之者寡，必然使社会萎缩，软弱。我跨过了被视为老年的界线，还能为社会做些什么呢？这是我第二个念头。

第三个念头是，我是不是有些事想做而没有做完的呢？跨入老年，自己应该明白，等于是说来日不多了。如果手上还有些没有做完的事，那就得抓紧做了。有没有做完的事，就看自己有没有要做的事。这是属于“人各有志”的内容。我在跨线之际也试图自己答复自己，“尔志何在”？我的答复也是四个字：“志在富民。”这四个字也许可以贯串地表现在我从30年代起所写的文章之中。当然这些都是纸上谈兵，但还不能不说是有志于此。富民作为目标，从80年代开始已看到了端倪，划在贫困线以下的不到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了。我有希望在这一生中能看到消灭在贫困线下的数字。

“志在富民”是不够的，还有一个“富了怎么办”的问题。我是看到这个问题的，但是究竟已跨过了老年界线，留着这问题给后来者去多考虑考虑，做出较好的答案吧。



1989年11月2日

家世与早年求学



费孝通的父亲费璞安(1879 - 1969)。曾在科举考试中取得生员资格。1905年东渡日本留学。回国后曾应张謇先生之邀赴南通当教师，兴办新学。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与民众一起赶走苏州及吴江县的满清官吏，并被选为吴江县议长。后任江苏省教育厅视学，一心从事教育。



费孝通的母亲杨纫兰(1880 - 1927)于1911年和子女们的合影。怀中所抱是刚满8个月的费孝通。其余四人左起依次为长子费振东，次子费青，女儿费认生，三子费霍。

1910年11月2日，费孝通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县县城(旧属苏州府，今为松陵镇)的富家桥弄。

我生在一个重视教育的家庭，我父亲是江苏省的“视学”，即教育督导员，我母亲是首创蒙养院即幼儿园的当时妇女界先进人物。我的父母上有祖母和她守寡的妹妹，下有子女五人，我是老五。一家九口的生活全靠父亲微薄的工

资来供养。母亲在家以有限的收入经营管理这个小集体。当她病重时，曾要我几个哥哥根据历年的日用账进行统计分析，按各项支出画成曲线，并列在一张表上。用红线表示的教育费用高高居上。她指着这张表说，她的理财原则是量入为出，先扣除教育费用然后以余额安排其他项目。我曾在一次全国政协会议上的发言中重复我母亲的理财原则，希望国家也能采用。找母亲按这个原则

把五个子女都培养成才。在她临终时说，除了最小的一个外，我对子女的教育是尽了力的，结果也能使我放心。她除外的一个就是我。我当时还是个中学生。我进大学是靠我姐姐的支持，进入了研究生院以后就靠国家的公费，完成了我的学业。一生督促我不敢自暴自弃的还是我母亲的那句遗言。

费孝通：《我的第二次学术生命》(1994)



费瓚安先生晚年留影

重九登高攝影
一九五九年
靈谷十一
璞盒

费璞安先生墨迹一则

费璞堂先生留学日本回国后曾在吴江县城开办第一所中学。杨纫兰女士在吴江创办蒙养院。这些事在清末民初是开风气之先的。费孝通大约四岁入蒙养院。六岁入吴江县城的第一小学，后转入振华女校就读。1923年转入东吴大学附属一中。1928年高中毕业，升入东吴大学，攻读预科，想成为一名医生，悬壶济世，救死扶伤。

1930年我放弃了作一个医生的想法而决定要作一个社会学者。……我不再满足于仅仅帮助个人治疗身体上的疾病的这个目标。人们的病痛不仅来自身体，来自社会的病痛更加重要。所以我决心不去学医为一个一个人治病，而要学习社会科学去治疗社会的疾病。

费孝通：《经历·见解·反思》（1987）

我在吴江小学里读书时，我的父亲是江苏省的视学，视学是教育督导员。他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在江苏省境内巡回视察各地的学校。回家期间忙于写视察报告。我常见他书桌上堆满了各地收集来的材料和笔记。有时为了好奇，趁他不在时，我偷偷地去翻阅这些材料。我虽则很多看不懂，现在还记得的是他随班听课的记录，还有评语，某某教师讲解扼要明白等等。他的视察实在就是在做有关当时教育的实地调查。他并没有料到在他的儿子中后来会有人继承了他的调查工作。他并没有在我面前讲过要了解社会必须亲自去看去问的道理，但是他作出了身教，身教显然比言教更起作用。

费孝通：《忆小学乡土教育》（1991）

2 壹貳第 3

先父遺稿

吴江光复前后回忆

費理安

辛亥革命前夕，我在南通教书。武昌起义不久，我从南通到上海，遇见史量才（当时高良才，在办报），他约我参加筹备行将召开的全国农事联合会。他说：“这是张伯苓先生（即张季直）主事的，通知已经发出，不久要在上海开会，你可以留在上海，帮助工作。”我当即答应，南通教书诸事即假托。

全国农事联合会是南满洲军发起,推举宣抚部长某为会长,佐任副会长,任事旨在市面被控为实业界、南满洲国粮业和棉业是地重利的,使通商开发全国农事联合会,自然思惠利和共谋他的外洋资本,假借得力助手是重要点,准备工作大半出自曹某之手,留我在沪了解也出面与军事力量决定的,但通商其时既未成立,会未因而举行,我与同事面议,即劝他和其他第四人闲居在会,无所事事,遂发愤作诗记一开会。

编入费孝通《爱我家乡》(1996)——书的“先父遗稿”文影

先母遺稿

《女界钟》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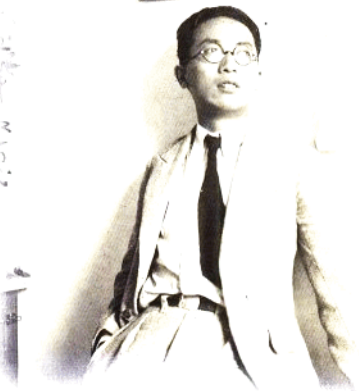
楊 炯 三

[illegible]

编入费孝通《爱我家乡》(1996)一书的“先母遗稿”文影



敬贈
偉大的恩師
你的兒子 費孝通



费孝通 1936 年留影

……首先可以提到的是我学习社会人类学的动机。我在《乡土中国》一书的导言中有过一段自白。当时作为一个三十年代的中国青年，处于民族和国家存亡绝续的关头，很容易意识到个人与社会集体的密切关系，而觉悟到不解决民族和国家的前途问题也就谈不到个人的出路。要在这个史无前例的大变动的时代里心安理得地做一个自认为是有意义的人，当时像我一样的那些青年人，开始认识到必须对我们所生存在其中的中国社会有清楚的理解，因而要求摸索出一条科学地研究中国社会的道路。

费孝通：《迈向人民的人类学》（1980）

王同惠女士上自左后

我得识王同惠女士，是在民国二十三年的秋季。我的“文化人类学”的班里。二十四年春她又上了我的“家族制度”班。从她在班里所写的报告和论文，以及课外和我的谈话里，我发现她是一个肯用思想，而且是对于学问发生了真正兴趣的青年。等到我们接触多了以后，我更发现她不但思想超越，为学勤奋，而且在语言上又有绝对的天才，她在我班里曾译过许让神父(Le P. L. Schram)所著的“甘肃土人的婚姻”一书(译稿在蜜月整理完成)；那时她的法文还不过有三年程度，这成绩真是可以使人惊异。

吴文藻：《花蓝瑶社会组织·导言》（1936）



王同惠女士(前立者)1933年初春时节与同学留影于燕京大学四院门外

瑶山民族调查



费孝通和王同惠结婚留影(1935)

二十四年八月(1935年)，她和费孝通由志同道合的同学，进而结为终身同工的伴侣。我们都为他们欢喜，以为这种婚姻，最理想，最美满。他们在蜜月便应广西省政府的特约出去研究“特种民族”。行前我们有过多次谈话，大家都是很热烈，很兴奋。我们都认为要充分了解中国，必须研究中国全部。

包括许多非汉民族在内，如能从非汉民族的社会生活上，先下手研究，则回到汉族本部时，必可有较客观的观点，同时这种国内不同的社区类型的比较，于了解民族文化上有极大的用处，我们互相珍重勉励着便分手了。行后常常得到他们的“桂行通讯”和报告，字里行间充满了快乐，勇敢，新颖，惊奇的印象，

读完了总使我兴奋。社会人类学在中国还是一门正在萌芽的学问，一向没有引起国内学者的注意。我自己数年来在悄悄地埋头研究，常有独学无友，孤陋寡闻之感。这一对“能说能做”的小夫妻，真鼓起了我不少勇气。

吴文藻：《花蓝瑶社会组织·导言》(1936)



陆续发表在当时北平晨报上的“桂行通讯”报影。现已找到的“桂行通讯”共有19期，分别发表于《北平晨报》、《天津益世报》和香港《宇宙旬刊》。



他们是 9 月 18 日到广西的南宁，当即开始和省政府接洽研究方案，并且就在当地测量特种民族教育师资训练所的瑶族学生的体质。双十节到了象县，又进行人体测量工作，18 日开始入大藤瑶山。因为社区研究需要较长时间往定的实地观察，而体质测量又不能不到各村去就地工作，所以由王桑，过门头，到六巷之后，同惠就住下专门担任社会组织的研究，而孝通则分访各村从事测量工作。11 月 24 日他们离开花蓝瑶区域到坳瑶区域的古陈。本来，依他们的计划在坳瑶工作一月，可以到金秀的茶山瑶区域，预计到本年二月可以把大藤瑶山的长毛瑶研究完毕。此后同惠便回到北平，继续在燕京大学作研究工作。谁知真在 12 月由古陈赴罗远的道上发生了悲剧。

由古陈到罗运的一段山路，极其曲折崎岖，而和他们同行的向导，又先行不候，以致他们走迷了路，误入一带竹林之中。林中阴黑，他们摸索着走近一片竹篱，有一似门的设备，以为是已到了近村，孝通入内探身视察，不料那是一个瑶人设下的虎阱！机关一踏，木石齐下，把孝通压住。在万千惊乱之中，同惠奋不顾身的把石块逐一移开，但孝通足部已受重伤，不能起立。同惠又赶紧出林呼援。临行她再再三的安慰孝通，便匆匆的走了。她从此一去不返，孝通独自在荒林寒夜中痛苦战战地过了一夜。次日天刚破晓，便忍痛向外爬行，至暮暮时分，才遇到瑶人，负返邻村。孝通一面住下，一面恳请瑶人四出搜寻，到第七天才在急流的山涧中，发现了同惠的遗体。她已为工作牺牲了，距她与孝通结婚之期才一百零八日。

吴文藻：《花蓝瑶社会组织·导言》（19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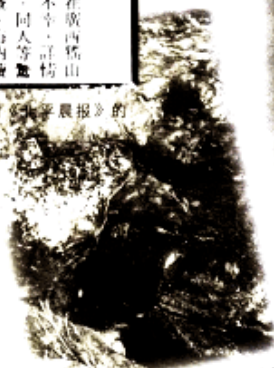
啓事

本社佔住王靜愚女士，在廣西梧州作社會學研究，因路途遙遠不幸，詳情已誌于十二日本報「教育界」，同人等驚悼之餘，擬爲之刊行紀念專號，海內遠邇者，如有知女士之詳細生平者，請不吝珠玉，賜知本社爲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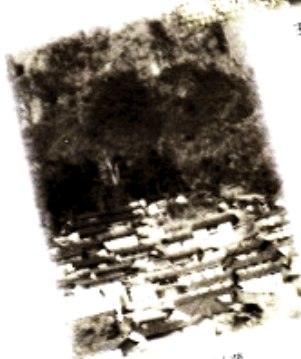
刊登于当时《北平晨报》的
启事



王同惠女士生前与瑶民合影



王同惠女士遇難處



大瑤山瑤族聚居的村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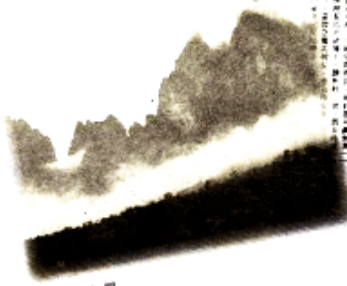
現任通出...

爲探求學術而犧牲
費孝通墮虎阱經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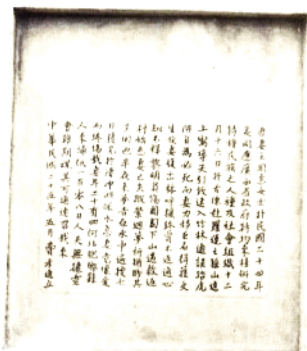
遇難當在十月下旬
擄扎一夜始爬出阱

（一）「新學」の流行と「新學」の流行は、明治維新の初期から、日本に西洋の知識が流入するにつれて、次第に盛んになっていく。その中でも、特に「新學」の流行は、明治維新の初期から、日本に西洋の知識が流入するにつれて、次第に盛んになっていく。その中でも、特に「新學」の流行は、明治維新の初期から、日本に西洋の知識が流入するにつれて、次第に盛んになっていく。

刊登于当时《北平晨报》的消息



大瑞山奇景



费孝通在养伤期间，请人精心设计王同惠墓，并亲笔书写墓碑碑文。王同惠女士下葬之时，棺木用两条粗铁链悬空吊在墓穴当中，以使之不沾泥土。

吾妻王同惠女士于民国二十四年夏同应广西省政府特约来桂研究特种民族之人种及社会组织十二月十六日于省城赴罗返之山道上向导失引致进入竹林遇猎虎所自为必死而妻力移匠石得获更生妻要复出林呼援终宵不返通心知不祥黎明负伤匍匐下山遇救返村始悉妻已失踪蒙迎梦折犹盼其生回也停殓来梦苦在水中通搜七日获见于潜冲洲深水急妻竟怀爱而终终伤妻年二十有河北肥乡县人来归只一百零八日人天无据哭会难期魂其可通速召我来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五月费孝通立

我既不死，朋友们一路把我接了出来。我为了同惠的爱，为了朋友的期望，在我伤情略愈，可以起坐的时候，我就开始根据同惠在瑶山搜集的材料编这一本研究专刊。这一点决不足报答同惠的万一。我相信，她是爱我，不期望着报答的，所以这只是想略慰我心，使我减轻自己的罪孽罢了。

费孝通：《花蓝瑶社会组织·编后记》（1936）

花蓝瑶社会组织

费孝通王同惠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11 月第 1 版封面，该书曾于 1936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平晨报

社会研究

花蓝瑶的家庭组织

（一）

王同惠著

花蓝瑶，是瑶族的一个支系，主要分布在广西、湖南、贵州等省的山区。他们有着独特的社会组织形式，以家庭为核心，形成了紧密的社区结构。本文旨在探讨花蓝瑶家庭组织的内部结构、功能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花蓝瑶的家庭组织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家庭是基本的社会单位，承担着抚养、教育和经济生产的功能。其次，家庭成员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分工和协作关系，共同维持家庭的运转。最后，家庭组织与社区紧密相连，共同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和仪式。

通过对花蓝瑶家庭组织的深入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到不同民族在适应自然环境和社会变迁过程中所形成的独特文化模式。这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瑶族文化的多样性，也为研究其他少数民族的社会组织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1936 年 3 月 18 日《北平晨报》第 11 版剪影



她为人类学献出了生命。她的庄严
牺牲使我别无选择地永远跟着她。

费孝通：《江村经济》(1939)



费孝通、王同惠合影



芳魂永系乡土的王同惠乡间留影(1933)

拖着半残的身体，伴着同惠的英魂，费孝通被送出瑶山养伤。想及与同惠生前的日日夜夜，他痛彻肺腑。瑶山里的工作，给了他俩多少快乐！虽说生活困苦，路程艰难，但他们有追求、有希望，有成绩，3个月里，总是“在极快乐的工作中过活”。直到王同惠遇难前一天，她还笑对费孝通说：“我们出去了会追慕现在的生活的。”

可是，一日之隔，便已是人天难接。斯人安在？笑意安在？她不过24岁芳华，才智初露，学业上刚开始迈步，美丽的生命就这么嘎然而止，天地间多么惨烈的一幕！

在锥心裂肝的悲恸中，费孝通笔下滴出了血泪字行：

“同惠死后，我曾打定主意把我们两人一同埋葬在瑶山里，但是不知老天存什么心，屡次把我从死中拖出来，一直到现在，正似一个自己打不醒的噩梦！虽则现在离我们分手的日子已经多过了我们那一段短促的结婚生活，但是闭眼，一切可怕的事，还好像就是目前，我还是没有力量来追述这事的经过。……让这一幕悲剧在人间沉没了罢。”

孝通真镇定，真勇敢，他在给我的信末说：“同惠既为我而死，我不能尽保护之职，理当殉节；但屡次求死未果，当系同惠在天之灵，尚欲留我之生以尽未了之责，兹当勉力视息人间，以身许

国，使同惠之名，永垂不朽”。这几句话何等沉痛，何等正大，又何等理智？读信至此，使我忍不住流下了悲哀钦佩的热泪。

吴文藻：《花蓝瑶社会组织·导言》(1936)

初 访 江 村



在家乡养伤，调查时的费孝通和开弦弓村的孩子在一起(1936)



集体排水(1936)



开弦弓村沿河的房屋(1936)



农舍中的炉灶和灶王爷神象
(1936)

我作为体质人类学者进入瑶山而出
来时成了社会人类学者。

费孝通：《经历·见解·反思》(1987)

话要从 1935 年我从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时说起。我毕业后由该校社会学及人类学系推荐，取得该校公费留学资格。按惯例应于该年暑假出国，但出于指导我研究工作的导师史禄国教授的主张，在出国前应到少数民族地区实地调查一年，因偕前妻王同惠赴广西大瑶山。该年冬，在瑶山里迷路失事，妻亡我伤，经医治后，我于翌年暑期返乡休息，准备出国。在此期间，我接受家姊费达生的建议，去吴江县庙港乡开弦弓村参观访问，她在该村帮助农民建立的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我被这个合作社所吸引，在该村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调查。在出国前夕才离开该村。这次调查并不是有计划的，是出于受到了当时社会新事物的启迪而产生的自发行动。

费孝通：《江村经济·前言》(1985)



开弦弓村的木桥(1936)



开弦弓村的稻田和桑田(1936)

我认定我这生的目标是了解中国的社会。这个目标固然具体，但中国之大、历史之久，如何下手呢？我相信科学研究必须有可靠的资料为根据，最可靠的资料是出自自己的观察，所以一开始就着重实地调查。研究社会，就得观察人的生活。到哪里去观察呢？我认为应当从基层入手。在中国就是到由许多家庭组成的农村里去全面观察农民的生活，要正确地认识中国，必须首先认识占人口 80% 的农民。这种看法奠定了我以农民为基本对象和以社会调查为基本方法的研究方向。当然，只看到农民，还是不能全面了解中国社会的，但认识全局只有从局部开始。

费孝通：《社会学文选·自序》(1987)



沟通村内外的运输航船(1936)

开弦弓生丝合作社所建立之丝厂为我国近代历史上兴办的第一个农村丝厂，受到国内外各界人士的瞩目，各级合作组织及中央合作研究班相继到开弦弓进行考察，……日本学者古田和子说：“开弦弓村开设的一座小规划的缫丝厂，虽是农村发展迈出小小的一步，却是现代中国极有价值的试验。”

《吴江丝绸志》(1992)



穿夏装的开弦弓村妇女(1936)



费孝通的姐姐费达生女士帮助开弦弓的村民建立的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丝厂远景(1936)

负笈英伦

1936年秋季，我到达英国时，见到雷蒙德·弗思(Raymond Firth)。马林诺斯基(Malinowski)那时正在美国参加某个大学的纪念会。他在那里遇见吴文藻，吴对他讲了我的我的工作，马林诺斯基表示有兴趣培养一个中国人类学者。但当到达伦敦经济学院之初，并未一开始就见到马林诺斯基。我见到弗思并和他谈了我的两本稿子。我问弗思这两部资料中哪一部应作我论文的基础。他觉得我写一篇关于中国农村生活的论文比较好。我后来写出《江村经济》一书，最初是他作出的决定。

马林诺斯基回到伦敦不到一周，我见到了他。他打电话给弗思说，“费孝通今后归我指导。”你大概知道英国制度是怎样的，博士待位生只跟一位教授作论文。这是一种师徒关系。马林诺斯基是弗思的老师，弗思是马林诺斯基的第一个博士生而我是最后一个，第十二或十三个。当我到达伦敦经济学院时，弗思是一位Reader。(高级讲师)相当于副教授。他是我最初的导师，马林诺斯基一句话从他手上把我接了过去。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之后，我回到中国，那时上海和广东都已被日本人占领。

费孝通：《经历·见解·反思》(1987)



费孝通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同学肯尼亚塔



费孝通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博士导师布·马林诺斯基

肯尼亚塔，费孝通就读伦敦经济学院时“今日人类学”讨论班的同学，后于1964年当选为肯尼亚共和国第一任总统。费孝通曾在《缅怀肯尼亚塔》一文中回忆道：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伦敦经济学院二楼马林诺斯基的办公室里。

我满怀着激动的心情走进这间已坐满了人的办公室，……教授的目光突然扫到我的身上，朝着我点了一下头，大声地向在座的同学介绍说：“这是从中国来的年轻人。”话犹未息，我身旁有一只巨大、有力、黑皮肤的手紧紧地把我握住，一股热情直传到我心头。……耳边听到轻轻的声音说，“我叫肯尼亚塔”，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和非洲的黑人兄弟握

手。

他是个无所畏惧，一心要为非洲同胞的平等自由而献身的人。他体格魁梧壮健，望去像是一尊雕像，似乎随时准备着挑起千斤重担。

在1938年返国之前，我读到了他在伦敦出版的《面对肯尼亚山》。我很爱这本书。……难忘的是在这本书里跳跃着的那颗热爱祖国，热爱民族的心。

他在垂暮之年亲眼看到了肯尼亚自己的国旗升在自己的国土上。这时他笑了，说出他衷心的感受：“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